

● 中国古代文学

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三)

程 二 行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程水金,字二行(1957-),男,湖北新洲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

[摘 要]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他们的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其次,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僭国大夫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官学;私学;游士;客卿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3-0330-08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由氏族封建制向国家集权制过渡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在政治上,是所谓“王纲解纽”;在文化上,是所谓“礼崩乐坏”;在学术上,是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在这个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士人一方面以自身的不断蜕变与分化回应着社会历史变革大潮的冲激,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发挥其自身的文化功能,不断地为深化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而推波助澜。顾炎武《日知录》以“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概说战国时代政治风俗的“衰变”^[1](卷 13),正说明士人群体的流动与衍变,是与时代变革相伴而行的。

文化上的“礼崩乐坏”,其突出表征便是“官学下移”。这是影响士人发生重大质变的直接因素。《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杜注:“失官,官不修其职也。”孔颖达引王肃曰:“孔子称学在四夷,疾时学废也。”^[2](卷 48)杜注“失官”则是,王云“学废”则非。因为学官不修其职并不意味着教育从此废毁,而是由官学替降为私学。

周代的官学下移,私学兴起,曾经为学者们津津乐道,以为这是平民教育的普及与扩大。其实,这纯属误解与错觉。据我们研究,周代的乡遂平民并非没有受教的机会,州党的庠、序,就是“六乡”居民受教的场所。而乡学的俊选之士还可入国学继续学习,通过特殊的考选,还有可能进入较高的官僚阶层。三年大比,以兴贤能,在西周是作为一种制度推行的^①。东迁之后,王室衰微,大比兴贤之制,也随之衰落。

* 收稿日期: 2001-01-12
基金项目: 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00BZV012)

至于惠王、襄王时代(前 676—前 620),兴贤之制不仅王室无闻,即使侯国君主欲觅国中贤能之士,亦须亲自过问。如《国语·齐语》载齐桓公责其乡大夫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如果大比兴贤之制存,“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应是乡大夫的分内之事,无须国君亲自过问,可见大比兴贤之制不行有日矣。

选士之制度,则乡校教育弛,这是互为表里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大臣,然明建议毁掉乡校。设想如果乡校的文化功能依然如初,负有教育乡民子弟并为朝廷选拔俊士的职责,然明决不至于出此下策。而子产也只是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仅以乡校为乡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亦不涉及其教育功能,可见这时的乡校不过是名存实亡,已无关教诲了。难怪在子产执政 3 年之后,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舆人以子产诲其子弟为重大政绩列于殖其田畴之前加以颂扬,可见在子产相郑之时,一度振兴过郑国的乡校教育。由此亦可见,官方的平民教育已经废弛到何等程度!因此,说官学下移,私学兴起,是平民教育的普及与扩大,值得商榷。

虽然官方乡校废弛,但平民教育却不绝如缕,这就是逐渐兴起并实际取代官方乡学的私家教育。

由官方乡校师资来源的考察,乡校蜕变为私学是较容易的。《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郑注:“古者仕而已者,归教于乡里。”又《书传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归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新谷已入,余子皆入学,距冬四十五日始出学。”^[31](卷 36《白虎通·庠序之学》)亦曰:“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由此可见,在乡学任教者,是年老退休的官吏,是“里中之老有道德者”。又《管子·问篇》:“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师众莅百姓者几何人?”言“处士”,则是未居官之人,言“使”,则意味着乡校教师乃由官方委任^②。

担当乡校教师者,为退役的官吏,或是“修行”的“处士”,或是“里中老有道德者”,这与辟雍或泮宫中担任贵族子弟的教师者相较,其身份大为悬殊。在天子或诸侯的国学任教者,是所谓保氏、师氏、大司马、乐正、乐师、太师、保傅之流。虽然他们往往身兼多任,不专以教学为务;但均为在职居官之人,与乡校中以致仕的官吏及民间人士任教迥然有别。因此,一旦国家的选士制度弛废,官方乡校教育立刻便土崩瓦解或名存实亡。只有那些真正愿意献身于民教的“修行处士”、“老有道德者”才能坚持下去。这样,官方的乡校也就自然而然地蜕变为私学了。

因此,大比选士之制度毁,是春秋时代“官学下移”的根本原因。而选士之制度,乡校教育弛,私家之学起,士人的性质以及进入仕途的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在学之士”或“学成之士”这一知识群体的通称。其身份就是与农、工、商并称为“四民”的“士民”,他们之中的多数,除了拥有知识之外一无所有。孟子说士“无恒产”(《孟子·梁惠王上》);苏秦曰:“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皆是其证。由此亦知,“士”的职业选择,只有两种,要么“仕”,要么“学”。冯友兰说,士“这个阶级,只能做两件事情,即做官与讲学”^[41](第 208 页)。用“做官”与“讲学”诠释“仕”与“学”,大致不差。

其次,士人进入仕途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比考选然后获得爵命的入仕方式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援引、推荐或自荐。《史记·魏世家》载李克与翟璜的一段对话,十分具体地说明了士人由推荐援引入仕的情形:翟璜、李克与魏成子,分别向魏王推荐了不少人才。翟璜推荐的五人之中,有四位是历史上的知名人物:西河守吴起、中山相李克、邺令西门豹以及著名战将乐羊子。因此,翟璜颇以能为国家推荐人才自矜。当魏王选择国相时,翟璜满以为李克会推荐自己。但李克却推荐了魏成子。于是,翟璜忿然质问李克,自己哪点不如魏成子。李克则将翟璜所推荐的五人与魏成子所荐三人相比,说翟璜所荐五人君以为臣,而成子所荐三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则君以为师。更为重要的是,魏成子推荐人才,并不是结党营私或沽名钓誉以博取更高的官位。这样,翟璜也就自知比不上魏成子了。由此可以想见,列国大臣大抵都可向国君推荐人才。由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诸人均在援引推荐之下走入仕途,亦可想见,战国时代其他士人的入仕情形,大抵如此^③。

不仅列国将相大臣推荐援引士人入仕,当时有名望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及其先进弟子,亦往往推荐其子弟与学友登入仕版。如孔子“使漆雕开仕”(《论语·公冶长》);子路亦“使子羔为费宰”(《论语·先进》)。墨子“游公尚过于越”,“仕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项子中”(《墨子·鲁问》)。又《墨子·贵义》记墨子推荐某人去卫地做官,其人至而后返,理由是给他的俸禄太少。而《公孟篇》载墨子收徒而许之以“仕”,其徒“期年”而责其践诺。孔、墨均推荐弟子入仕,想来其他学派的大师当不会例外。

当然,亦有当国之主要求著名大师荐拔其弟子入仕者。如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可使为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又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又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及冉求能否从政,当是于孔门弟子中物色家臣。

因此,选士之制与乡校教育废弛之后,私家教育兴起,不仅改变了士人的性质;也改变了士人们的入仕方式。正是由于推荐援引成为士人们入仕的主要方式,因而士人游说自荐便浸假而为战国时风。

春秋时代,为了争夺霸主,诸侯也往往礼遇敌国来奔的大臣,从而形成“楚材晋用”并“疲惫宗国”的现象。如楚国申公巫臣,挟夏姬奔于晋国,“晋人使为邢大夫”。及楚共王即位,楚人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于是巫臣决心报复楚国。其策略是“通吴于上国”,“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使楚国腹背受敌,疲于奔命(《左传》成公二年、七年)。又如,效命于吴国并使楚国在柏举之战一败涂地的伍子胥亦为楚人,而辅助越王句践兴越灭吴的范蠡与文种,亦是楚人。当然,春秋时代,诸侯礼遇亡命来奔的异国人士,往往是一种不自觉的举动;而亡命出奔者趋向何国,亦有相当的偶然性。如申公巫臣本打算奔往齐国,由于齐国刚刚在鞍之战中败于晋国,于是打消了奔齐的念头。此外,出奔者往往是失势的贵族而非一般的士人。

时至战国,士人自荐登入仕途乃一时风会,形成了所谓“游士无宗国”的局面^①。士人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摆脱了宗国的局限性,为他们施展抱负,成就功业甚至追逐名利提供了广阔的行为空间。如:公孙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史记·商君列传》);苏秦、张仪皆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虞卿亦“蹶躅檐簪说赵孝成王”,为赵之上卿(《史记·平原虞卿列传》);皆是其例。与游说之风相辅而行的,是所谓“客卿”现象。“客卿”本为秦国对客籍士人的称呼。如《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三年有“客卿胡阳”,三十六年有“客卿灶”等。而“客卿胡阳”在昭王三十八年又称“中更胡阳”。又司马错在秦昭王十六年任左更,《史记·秦本纪》称之为“左更错”,而《白起列传》又称之为“客卿错”。范雎初入秦,亦拜为客卿(《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又《乐毅列传》亦云燕赵皆以乐毅为“客卿”。则“客卿”一名,似乎非常设之官职,而是一临时之称呼。

战国时代,列国君主不仅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招揽人才;士人们的取舍,其功利性更为明显。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史记·燕召公世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燕昭王“卑身厚币”,齐宣王“高门大屋”,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各国君主大抵皆是如此。王充《论衡·效力篇》云:“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因此,各国君主延揽人才不遗余力,也并非仅仅是为了博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而是出于富国强兵以应付日益剧烈的兼并战争。等而下之者,各国卿相及贵介公子为了保住宗族利益或是巩固个人地位,亦纷纷私养门客以挟制人主,竟至于“扛鼎击剑,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亦是有鉴于“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同一道理。

官学演变为私学,大比选士之制弛废;为了谋求出路,士人们不得不以游说自荐的方式进入仕途,这是形成战国游士风气的主体因素;而急剧的兼并战争所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由上陵僭国的大夫为收买人望邀誉诸侯所形成的礼士之风,则是导致士人能够朝秦暮楚择木而栖的客体因素。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催发,致使战国时代的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克服厌学情绪,潜心向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登侯王相的仕途幻觉成为

士人的流行风。

春秋时代,官学衰落,选士之制废弛,士人出路受阻,于是逐渐滋生厌学情绪。如《论语·子路》: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之请,历来注家多不得其解,唯清人刘宝楠差为得之。刘氏曰:“当春秋时,世卿持禄,废选举之务,贤者多不在位,无所得禄。故樊迟请夫子学稼学圃,盖讽子以隐也。”(《论语正义》卷16)刘氏以为樊迟请学稼学圃乃讽劝孔子退隐,似乎难以确证。但他联系春秋末世的时代风气发掘樊须当日的隐曲深衷,不愧为巨眼卓识。又刘氏于《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下亦曰:“古者四民各习其业,自非有秀异者,不升于学。春秋时,士之为学者,多不得禄,故趋于异业,而习耕者众。观于樊迟以学稼学圃为请,而长沮桀溺荷蓑丈人之类,虽隐于耕,而皆不免谋食之意,则知当时学者,以谋食为亟,而谋道之心或不专矣。夫子示人以君子当谋之道,学当得禄之理,而耕或不免无馁,学则可以得禄,所以诱人于学。”(《论语正义》卷18)在“选举之务”废而贤者“无所得禄”的时代氛围之中,与其饱读诗书学干禄,不如学一点稼圃之类实实在在的谋生技能来得稳当。看来,樊须一定是感觉着仕途经济的渺茫无望,而出此下策的!然而,孔老夫子并未洞悉这位弟子“读书无用论”的内心隐秘,而是不问青红皂白地辱骂与指责,说什么从政者只需以礼义化民而无需教民稼穡,与樊须本意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了。又《论语·先进篇》曰: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羔尚未学成,子路便急急忙忙引荐他去做费宰。孔子认为这是害人,但子路却强词夺理。孔子也无可奈何,只好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舌如簧文过饰非的家伙!”显然,这则孔门轶事的背景,正是当年逐渐泛滥的厌学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厌学情绪已经传染到上层社会,甚至波及到王朝的公卿大夫。《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鲁国使者去曹国参与会葬,拜见了同来会葬的周大夫原伯鲁。在交谈过程中,鲁国使者感觉到原伯鲁也有厌学情绪,回国后告诉了闵子马。闵子马认为,一定是下层社会的厌学情绪十分强烈,因而波及影响了在位者。而在位者又认识糊涂不能明辨是非。如果容忍这种不学无术以从政的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必然导致下陵上替,发生内乱^⑤。他还据此预言原氏将有灭族的危险。闵子马批评原伯鲁“不说学”,其话语是十分尖刻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人嘲笑周大夫“不说学”将有灭族的危险,曾几何时,这种厌学情绪也感染了鲁国的国君。《韩诗外传》卷五曰:

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

作为一国之主,鲁哀公竟然提出如此愚不可及的问题,实在不免唐突失问。但联系上述背景,哀公之问又确乎有感而发。在上上下下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时代氛围中,鲁哀公有是惑而有是问,不其宜乎!

上述诸事,均发生在《春秋》鲁国昭、定、哀三世(前541—前468),其时已是春秋末叶而临近战国。然而,也许是物极必反罢,在前后不到40年的时间之内,社会风气却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有赵襄子一则旧闻:

王登^⑥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以](原阙,据王先慎说补)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旦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赵襄子使任登为中牟令,任登又推荐了中章胥己二位中牟之士。赵襄子亦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们为中大夫。此事在中牟一带引起了很大震动。“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士人向学之风一

夜之间腾然而起。于是有宁越者苦心向学而终为王者之师。《吕氏春秋·博志》曰: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事实上,仅一赵襄子超擢士人,当不足以扭转一时风气。韩非子所言,或许杂有法家抑文学尝耕战的偏激情绪,但也并非尽是夸大之词。据钱穆的考证,宁越之事周威公,其时约在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前后。周威公立在威烈王十二年,“相距凡十年,其时正魏文、鲁缪尊儒礼贤,子思仕鲁卫,吴起仕鲁魏之际也。游仕渐得势,故宁越亦苦耕稼而从学问。其事虽微,足征世变”(《先秦诸子系年》卷 2)。赵襄子秉政 51 年,死于周威烈王元年(前 425),宁越学 15 年为周威公师,则宁越始学,约在赵襄子死前 3 年(前 428),其时正魏文侯十八年,上距鲁哀公出奔的贞定王元年(前 468)正好 40 年。可见士人由厌学到向学的转变是何等之急遽。诸侯礼贤极大地改变了士人心态。

宁越以 15 年时间,完成 30 年的学业^⑦,昼夜兼程,不敢休卧,其目的便是免除耕稼之劳苦,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宁越从学之动机,代表着战国时代士人从学的一般心态。晚于宁越将近百年的著名游士苏秦可为佐证。《战国策·秦策一》述其读书之苦状及其心理云:

乃夜发书,陈篋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苏秦不欲“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之利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不惜“引锥刺股,血流至足”。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人主“出其金玉锦绣”而“取卿相之尊”。

以学问作为仕进之阶,作为“取卿相之尊”的利禄之路,宁越与苏秦是成功者的突出典型。至于那些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姓名不彰的成功或未成功者究有多少,不得而知。其中多少士人是怀着朝为田舍郎暮为王侯相的仕途迷幻而头悬梁锥刺股,又何可究诘!有谁又能肯定范雎、蔡泽、虞卿这些“家贫无以自资”、“蹶躅檐簷”、“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的贫苦士人潜心苦读的动机,不是为了改变自己悲苦不堪的命运!《吕氏春秋·尊师》曰: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驂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此六人并非生在战国,但《吕览》的作者却在战国末年。因此,这段文字实则暗示着战国士人的普遍心态。

二是平交王侯傲视人主以张扬个性,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

周室东迁之前,君臣关系的确立,有所谓“策名委质”之制。“策名”即是“策命”。先由史官当场宣读命书,命书上记载着所命之职及任命理由。策命完毕,受命者的职权与义务即已确定。“委质”即是“奠贄”,是臣下对于君上所行之“贄见礼”。“贄”的品级与授受方式虽然因相见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目的与意义,则都是一样的。即以“奠贄”之礼,表示对君上的臣服与忠心,并承担对君上应尽的职责与义务^[5](第 338—370 页)。“策名委质”之制,春秋时尚仍其旧。《国语·晋语九》载晋人伐狄灭鼓,鼓子之臣夙沙釐,甘愿以妻孥随鼓子为奴。夙沙釐曰:“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

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由此可知,“策名委质”不仅仅是确立君臣关系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外在形式所包蕴的君臣名

节。韦昭《国语注》云：“委质于君，书名于册，示必死也。”司马贞《史记索引》云：“古者始仕，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6]（卷67）很明显，这种君臣关系，实际上就是无条件的人生依附，一旦委质为臣，便终身无改。而且这种“委质而策死”，也被士人们认为是“古之法”、“古之制”，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

然而，时至战国，由于兼并战争所造成的人才渴求，以及由上陵僭国的大夫为收买人望邀誉诸侯所形成的礼士之风，使士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充分高扬，从而追求确立某种新型的君臣关系。

战国时代，首开君主礼士之风者是魏文侯。魏文侯以大夫僭国，遍礼贤士以笼络人心博取声誉。据《史记·魏世家》所载李克谓翟璜之语，魏文侯对待士人有两种不同态度：一是以之为师；一是以之为臣。以之为师者，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之为臣者，吴起、翟璜、李克、西门豹、乐羊子、屈侯鲋。当然，以之为师，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欺骗而已，其实质仍然是臣。《孟子·告子下》载淳于髡之语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赵岐注云：“鲁缪公时，公仪休为执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为师傅之臣。”“师傅之臣”，一语道破。名为师，实为臣，不过比他臣多加一些尊敬而非仅颐指气使而已。然而，即使如此，也极大地刺激了士人们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从而唤起了士人莫大的自尊与自傲。田子方与魏太子击的一次对话，透露着这一消息。《史记·魏世家》云：

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骰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怩而去。田子方以王师自傲，竟将王储不放在眼里。他之所以能以“贫贱者骄人”，便是出于“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心理。也许田子方对待太子击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或者这故事本身就是战国末年的士人欲以道统与君统对抗而虚构（其事《韩诗外传》卷9及刘向《说苑·尊贤》均有载，文字略有不同）。然而流风所及，一般士人亦开始向人主要求更多的人格自尊。如《吕氏春秋·下贤篇》云：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翟黄并不明白，文侯所“礼”，不过是那些“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与他保持一定政治距离者，象翟黄这样居官任职鞍前马后死心塌地的人，则不在所“礼”之列。但他能主动向人主要求失落的自尊，这本身就体现着强烈的人格意识。又，鲁缪公与子思为师友之争，亦发生过类似的不愉快。《孟子·万章下》曰：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以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也；奚可以与我友？

孟子揣摩子思之不悦，曲尽其衷。鲁缪公自以为礼贤下士，不以子思为臣，而以朋友相待。而子思则不以为然，认为要么就是君臣，要么就是师弟子，不可能是朋友。看来，子思比翟黄更加心高气傲，自认为德行超过君主，君主应执弟子之礼相见。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结果。据孟子所言，鲁缪公对子思仍然礼遇有加，且“亟馈鼎肉”；但子思以为“君犬马畜伋”，竟“褻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因为，子思自觉其价值不仅仅是一个“臣子”或者等而下之的“食客”，而是怀抱利器的王者之师。

子思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便形成了弥漫士林的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估价。其再传弟子孟轲就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孟子·公孙丑下》云：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在齐而不见用，于是悻悻然离齐而去。但去齐之时，仍然希望齐王改变主意，思想“王如用予，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他自信有能力“平治天下”，并且“当今之世”，也只有他才能平治天下。不能肯定，孟子的自命不凡，其中有多大程度的自夸；然而，这种自命不凡的口吻，确乎流露着一般士人的强烈自信！而这种自信，必然要导致“士贵”与“王贵”的冲突。如颜闾论“士贵”，正发生在与孟子同时的齐宣王

之世。《战国策·齐策四》载:

齐宣王见颜斄,曰:“斄前!”斄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斄,人臣也。王曰‘斄前’,亦曰‘王前’,可乎?”斄对曰:“夫斄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斄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斄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固然是论者的言语技巧,但“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禹、汤由是而兴,文王、周公“世称曰明主”亦“以明乎士之贵”。如果说孟子的“舍我其谁”表现了士人对于社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那么颜斄的“士贵论”则是士人为世君人主照亮未来的指路灯。

然而,有所作为的君主毕竟是少数,现实之中大量存在的是庸常之主。战国时代流传着不少有关“君臣遇合”的历史佳话,如传说与殷高宗武丁的故事:

传说被褐带索,庸筑于傅,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墨子·尚贤》)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楚辞·离骚》)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尚书序》)

又,吕尚与周文王的故事: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楚辞·离骚》)

师望在肆,昌何识?

鼓刀扬声,后何喜?(《楚辞·天问》)

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战国策·秦策五》)

又,宁戚与齐桓公的故事: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而该辅。(《楚辞·离骚》)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而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吕氏春秋·举难》)

此外,《孟子·告子下》所谓“传说举于版筑之间,鬲胶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以及《战国策·秦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等所载关于范雎、蔡泽的诸多传奇性故事,皆与此同类。这些流传的历史佳话,很难说不是那些怀才不遇而处于困顿的士人们所心造的幻影。

当然,由于士人强烈的自信心理与高度的自我估价,不仅助长了士人的孤高自傲,也促使更多的士人老死于林下。那放言“士贵”的颜斄最终归居于“邑屋”,便是极好的例证。夫隐居于岩穴的不仕之士,从高自标榜转为对时君世主及社会现实的猛烈抨击与无情的批判。可以说,这仍然是“以道自任”与“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的逆向流露。

综上所述,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其次,其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同时,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以及僭国大夫的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注 释:

① 笔者另有《造士·选士·命士——先秦士文化的发展道路》一文,论之较详,兹不赘述。

- ② 《周礼·小司徒》有“乡师”,其职乃“各掌其所治之教而听其治”且“辨其可任者”。看来,乡师的职责类似后世之督学,并负有委任教师之责。
- ③ 《吕氏春秋·知度篇》云,赵襄子时任登为中牟县令,上计时推荐中牟之士胆胥己,赵襄子接见胆胥己后,就任命为中大夫。又《战国策·齐策三》“淳于髡一日见七人于宣王”,《齐策一》“邹忌事宣王,仕人众”,《齐策四》王斗见齐宣王,“举士五人任官”,所言皆是其类。
- ④ 陈登原《国史旧闻》有“先秦游士无宗国”条,可参。
- ⑤ 俞正燮曰:“闵子马言周人多不说学,及大人闻之,初恐不学有害而疑此不说学之言。继则多闻是说,而大人又为不疑之言以自决,曰可以不学,不学无失也。是风俗既成,大人亦诵言之,苟且凌替,则真失也害也。”(《癸巳类稿》卷二“患失而惑义”)俞氏所言极是。
- ⑥ 顾广圻曰王当作壬,《吕氏春秋·知度篇》作任,壬任同字。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一。
- ⑦ 按《说苑·建本》亦载宁越之事,但学年之数略有不同,作“学二十年则可以达”,“十三岁学而周威公师之”。

参 考 文 献]

- [1] 顾炎武.日知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2]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A].顾颉刚.古史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 杨 宽.古史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 旧 泂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7] 程二行.造士·选士·命士——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1).

(责任编辑 何良昊)

The Changing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cholar's Mood in the End of Chou Dynasty

CHENG Er-x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G Er-xing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 Chinese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ulture & literature of pre-Qin Dynasty.

Abstract Some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social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so that the character and spirit of scholars changed immensely. First, for the offici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evolved into private school, and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 and appointing had been abolished, the learned men turned into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ir road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changed. They must recommend themselves to king of states or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and those new aristocrats to strengthen their national power needed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ed persons, such and so,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of lobbying for recommending oneself came into its own. Second, needing for talents widely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in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the one, studying hard for high political place, and the another, processing self-confident or proper pride. This mental state indicated that scholar culture was developed.

Key words offici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rivate school; fluid scholar